

# 思想流动、域观常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金 碚<sup>1 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郑州大学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人是有思想的行动者 因此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渗透着无所不在的“思想”因素。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 人类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之外 还会发生思想的流动; 人类丰富的思想因素以及域观元素的强大作用, 导致人类发展表现为极为显著的多元域观常态现象。尽管工业化、城市化等现象是人类发展的普适性共同趋势, 但是各国各地区的现实发展态势却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即各有各的域观常态。所谓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 并非仅仅是土地、资本和流动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或配置)表现, 而且是受到思想因素及其流动的强烈作用和影响的历史过程。既然拥有不同域观元素的各种域观经济的“常态”系统是共存和交互作用的, 那么各种经济常态系统的治理体系, 以及各经济常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治理方式, 则成为人类发展中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思想流动; 域观常态;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 0-0; F 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0)01-0001-08

笔者曾撰文讨论现实世界并非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假设或想象的匀质性经济空间, 或断定其“优化”和趋向的“最终”状态是由经济理性唯一主导的匀质性“合理”状态, 而是域观性的非匀质状态。也就是说, 现实世界的经济空间是非匀质的, 它不是同质“原子”所构成的微观世界, 而总是呈现为“区域”“领域”“群域”结构的域观世界。因而, “市场”不能被想象为一个空盒子般的无差异场所, 其现实形态是非匀质的“域场”空间<sup>[1-2]</sup>。探其究竟, 这是因为, 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 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和进化性, 是决定现实世界域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是有思想的行动者, 因此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渗透着无所不在的“思想”因素; 并且思想是灵动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 流动和变化着的思想性域观元素, 导致各国各经济体具有各自特色的域观常态; 它们不仅并存着, 而且也相互影响着。因而, 人类发展的总体格局和演化态势是, 各经济体都有其自身的“正常状态”, 即合理存在的“常态”。正如黑格尔所说: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 各种自成一体和具有特色的经济“常态”的演化趋势并非向着世界唯一“合理”的同质状态收敛, 即使是强大的经济全球化潮流, 也不可能消除这种世界性和广泛性的域观常态现象。所以, 各国各经

济体必须在这样的域观常态现实中探索, 并且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和选定自己的进步取向, 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

## 一、罗默模型的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教授, 以一个简单的模型展示了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思想流动的重要作用, 表明“全球化是由思想再利用带来的收益驱动的, 思想的国际流动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从而可以解释, 为什么尽管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富国, 但穷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逐渐追赶上富国。也就是说, 穷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 并不是仅仅表现为人均收入增长。如果用人均收入不均来计算, 全球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但如果考虑预期寿命, 则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却从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开始下降了。保罗·罗默说, “如果穷国和富裕国家的制度能够允许穷国的工人免费得到富裕国家的药品配方, 我们将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 而不必依靠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sup>[3]</sup>而“药品配方”是一种“思想”, 它是可以免费获得的(除非在制度上设置排他性障碍)。罗默模型的表达公式是:

$$Y = A(T(T^* R) R) F(\cdot)$$

收稿日期: 2019-11-09

作者简介: 金 碚(1950—)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式中,函数 $F(\cdot)$ 是传统的生产函数,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的投入;函数 $A(\cdot)$ 是生产率函数,它取决于当地技术思想 $T$ 和制度 $R$ ,即 $A(T, R)$ 。而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思想的可流动性,所以当地的技术思想存量又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存量以及当地的制度,即 $A(T^*, R)$ 。如果其他地区的技术 $T^*$ 是非竞争性的,那么 $T$ 就可以倾向于等于 $T^*$ ,即免费获得其他地区的技术;但由于制度的限制(专利保护或保密), $T^*$ 中的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实际可用于本地生产的技术取决于当地制度 $R$ 所带来的激励,即当地的经济主体有多大的动力去努力获取其他地区的技术,而这种动力积极性取决于制度 $R$ 。

罗默认为,“穷国实现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现有非竞争性思想的引入。”<sup>[3]</sup>不过,其他国家的技术 $T^*$ 是在有效的制度 $R^*$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技术引入国的制度 $R$ 同 $R^*$ 有很大差距,本地的技术 $T$ 就难以成为 $T^*$ ,即无法采用更有效的非竞争性思想。也就是说,缺乏有效管理能力的制度 $R$ 不能接受技术 $T^*$ 。当然,制度 $R$ 和 $R^*$ 也都具有思想性,所以“制度 $R$ 本身就是可以从其他国家复制的非竞争性思想”<sup>[3]118</sup>。只要能够实现思想的域际(国际)流动, $T^*(R^*)$ 也能够与当地制度 $R$ 实现很好的匹配(即在 $A$ 国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技术可以在具有不同制度的 $B$ 国中得到适应性运用)。因此,罗默说,“有些思想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引入,并提高生活质量,即使在当地制度体系与现代市场体系中习以为常的制度相去甚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sup>[3]119</sup>

在罗默模型中,技术和制度中都含有非竞争性思想因素,即都有可免费复制获得的因素,思想的流动可以成为推动增长和发展,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力量。不过,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思想的流动及其效果是非常不同的。其中制度体系的改革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涉及各种利益关系,不易形成共识。罗默说:“现行的法律保护 and 保密性相结合,使许多非竞争性物品至少具有部分排他性。因此,能够将他人排除在外的人所面临的激励就会影响思想的扩散。”<sup>[3]118</sup>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元制度(即用于改变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能使人们更容易从现有制度过渡到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行的制度,那么它就是特别有价值的创新。”<sup>[3]120</sup>

罗默模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人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事实:在

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之外,还会发生思想的流动,不同于商品和服务大多具有竞争性,而思想因素大多为非竞争性,即可以免费复制。思想流动可以有力地解释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很大部分。存在于“技术”和“制度”中的思想,即罗默所说的“技术思想”和“制度思想”,虽然在经济学意义上可以是非竞争性的(可以免费复制获得),但在现实中,由于制度性质(规则安排)或其他原因,非竞争性思想也可能具有排他性(即受到阻止而难以流动)。所以,改变阻碍思想流动的制度安排,对于加强思想的域际和国际流动性,使之更有力地助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二、思想流动体现“域观元素”的重要价值

罗默模型的成立基于对经济事实的观察。由于在不同的国家或域境中存在技术和制度的差异,其经济学性质可以定义为内嵌于生产函数中的“思想因素”。如果不存在思想流动复制的障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制度中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的“思想因素”,实际上是各国或各域境之内所拥有的无形“域观力量”。这些域观力量在本国或本区域之内,是既存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重要元素(或推动力);而如果流动到其他国家或域境中,则可以发挥助推流入国或流入地区(或领域)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在学术上可以想象,在经济体系中,除了有可以体现在传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无形思想元素或思想性域观元素(简称“域素”)。思想差异既是不同经济体的域观特征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深刻根源,即思想差异反映了各域类中的域素存量差异。思想性域素存量的差异性在一定的激励作用(制度安排)下,必然导致或诱发思想流动,即思想性域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转移。这种思想流动和域素转移,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对传统经济分析所采用的生产函数方法难以把握的现象,做出更符合现实的合理解释。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这样的思想存量或思想性域素存量,不仅在以国家或地区为分界的经济空间之间存在差别,而且在以其他维度(经济特性)为分界的经济“域类”中,例如,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中也存在域素存量或思想存量的差别。因而,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不同思想或不同域素的域际也可能发生流动。这种域际流动,同生产要素的域际流动或商品及服务的贸易活动相类似,也可以促进

经济体中不同域类群体间的能量交流和进化发展。

由此,不免产生一个附带的理论争辩问题。由于大多数技术思想和制度思想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其流动转移可以采取免费复制(被模仿而不产生“稀缺性”和增加原拥有者成本)的方式,那么,是否只要使流动复制过程充分通畅,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间的思想存量差距或域素存量差异就会趋于收敛,直至消失?即主要体现为思想差异的思想性域素存量差异是否会长期存在?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市场经济机制的一个根本性认识。即市场竞争是否具有“搅拌机”功能?也就是说,只要充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市场机制就可以像“搅拌机”那样,使整个经济体系成为完全匀质的经济空间。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因此,从“优化”思维出发,微观——宏观范式,尽管不否认现实经济的异质性,即承认各国、各地区、各经济领域的差异性,但其逻辑体系则“假定”经济空间的充分同质性。这实际上上是假定经济机制完全的机械性,经济行为完全而且唯一地具有经济理性(而没有其他思想因素)，“商品”和“服务”像原子般,完全没有思想的差异性;或者即使存在思想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会强烈地趋于收敛。

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涉及关于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指出,“人类的行为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是多维度的。”“当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建模去认识市场的运作机理时,他们就不得不对市场的真实形态进行线性简化,但有些简化过于极端。例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假设人是完全自私的,但现实中有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也拥有超越狭隘自我利益的行为动机。”<sup>[4]</sup>也就是说,在被经济学所简化的理论模型中,人的行为动机除了自私的“理性”之外,再没有其他“思想因素”。但在现实中,任何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都不可能极端化为只有极为简单而纯粹的“理性”,而且是经济学所假设的“工具理性”。行动着的人和人类的行为和动机是复杂的,其特性或表现是多维度的。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使得经济体和经济现象都具有其各自的域观特征,因而经济关系不只是同质经济主体间的抽象微观关系,而是各种复杂多维的域际关系。

由此,无论是从理论辨析上,还是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商品及服务的自由贸易,并非域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思想”的差异,即“域素”的存在,及其流动和进化变异,是

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的现实性态(经济关系包括贸易关系的实质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或物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思想性域观元素具有价值文化性,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累积形成,其进化性决定了永远具有多样性。通俗地说,“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历史就不会有那样的价值文化特质。”所以,“思想”的丰富性和累积演化性,决定了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所假设的经济(市场)图景的非现实性,以及域观范式所刻画和描述的域观图景的现实性。

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仑在20世纪初就提出,经济研究应关注文化和文明的演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影响。他说,“发展和变迁现象是经济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最明显、最重要的事实。”“经济学家的考察并不是独立于物质文明的其他所有阶段以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去研究一种抽象的所谓‘经济人的动机。’<sup>[5]199</sup>对物质文明的理论考察,包括经济学研究“都要考虑文明的演变,考察它与其他阶段的关系,以及与文化复合体的关系;都要考虑其他类型文化的发展对它的影响,以及它对其他类型文化的影响。”<sup>[5]206</sup>

### 三、域观元素与域观常态

我们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经济活动,通常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按生产函数的思维框架(模型)来简化地把握,因而各经济体的经济差异性被想象为是由于生产要素丰度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在现实中,不同国家、地区及经济领域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由于存在生产要素不同丰度之间的差异(这由传统的生产函数思维来把握),而且存在思想因素及思想性域观元素之间的极大差异,这必须由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思维来把握。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经济体的生产过程不仅被想象为相同及不同生产要素的结合,而且是生产要素同思想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样,各经济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均会含有各具特色的思想性域观元素。在经济学的概念定义上,域观元素同生产要素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受思想因素的深刻影响,即很大程度上具有思想性;而后者更具客观性。因而,在广义上,各经济体中的思想因素(在其未流动时)可以被视为思想性域观元素。域观元素同生产要素不是简单相互结合关系,而是具有深刻的渗透性和泛在性,即思想性域观元素往往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内在成分(技术思想)而存在,并且提供生产要素结合(即生产过程)的规则(制度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体中的生产活动必

然有域观元素的参与,经济活动总是具有很强的域观特征:“生产国”“生产地”“生产者(厂商)”的域观元素,都会在其产出中打下深刻烙印。

由于任何经济体(在技术上和制度上)都含有思想因素,思想性域观元素的作用体现了各经济体的技术、制度以及更具深刻性的价值文化特性,所以各域观经济体及域类群体,都必然会有其显示性的域观常态,即通常表现出的“想法”(思维方式)和“做法”(行为方式)的域类特点。这样,各域观经济体及域类群体中普遍具有的“想法—做法”特点,决定了各个“域观常态”的性质及其显示性状态。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各经济体(各国、各地区、各经济领域及群类)的经济行为表现尽管有共性,即一些“想法—做法”的普适性,但也总是存在各不相同的“想法—做法”差异性,很难成为“全都一样”(高度同质性)的微观经济主体或宏观经济主体。

我们只有承认域观常态的存在,才能认识思想流动和域观元素域际转移的重要意义。异质多元共存的世界才是不断进化着的真实世界,在具有不同域观常态的经济体间进行各种元素(要素)的交流互动和融汇结合,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极大繁荣。为此,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两次影响最为深远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奇迹(即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规时期”):西方工业化。它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当时经济并不先进的英格兰岛国。欧洲大陆的思想因素,特别是荷兰等国的商业“想法—做法”助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然后,英国的域观元素向西方各国,特别是北美洲转移扩散,推动西方世界更多国家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历经200多年,使全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次奇迹:中国工业化。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输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地从苏联引入思想因素,将长期的农业国域观常态转向经济发展思想的工业国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现代市场经济思想因素的引入所推动。自此以后,外部技术思想和制度思想向中国流动的障碍被逐步消除,世界发达国家的各种“想法—做法”思想因素的大量流入,助推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大加速。不过,中国作为文化深厚的巨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思想因素存量积淀,其自身所拥有的“想法—做法”域观元

素极为强大和稳固,因而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域观常态——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过程历经数十年,也使得全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可见,人类丰富的思想因素以及域观元素的强大作用,导致人类发展表现为极为显著的多元域观常态现象。尽管工业化、城市化等现象是人类发展的普适性共同趋势,但是各国各地区的现实发展态势却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即各有各的域观常态。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是,几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正常状态”都不尽相同。因此,各经济体在不同的“想法—做法”域观常态下,必然形成极具域观特征的“活法”和“治法”,即适应各经济体的域观常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向。

#### 四、开放流动与治理现代化的方向

人类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根本方式就是流动:商品(服务)流动、资金流动、人员的流动、思想(信息)流动。而流动的前提是开放。一个经济体愈是开放,人财物流动就愈是畅通;特别是思想与信息的流动愈畅通,其发展潜力就愈强。因此,本文就所讨论的主题而言,可以归结为:思想吸纳力和域素聚合能力,决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任何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都取决于其开放性及其制度安排(激励机制),都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增强其对思想流动的承接能力,以及对思想性域观元素的集聚发扬能力。

如前所述,中国数十年的工业化,形成了同西方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所不同的另一种域观常态体系。中国以数十年的努力就创造了可与西方世界二三百历史相媲美的工业化奇迹,当然是从西方吸纳了大量的思想因素。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经济体的域观性质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域观元素的集聚发扬能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域思想流动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曾经的强大正是这一文明特质尽情张扬的表现;一度的停滞甚至衰落,则是自我封闭,特别是阻塞思想流动,僵化固守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一些先贤大声疾呼,要“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当时,其最具重大和决定性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轫及播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质再次得以释放和发扬光大,并以“思想解放”迎接思想流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精神集

聚全球域观元素。经过 40 年的奋力拼搏、不懈努力，中国很快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唯一的所有产业门类齐全的生产体系。这最直观地表明了，全球生产体系中所有的技术思想都在向中国流动，各种制度思想也从各个领域向中国流动<sup>①</sup>。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部思想的流动和吸纳，与中国自身的域观优势相融汇，激发起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于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面貌彻底改观。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大幅提升并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不过，西方思想的流入，并非是中国的全盘西方化。中国价值文化和制度特质具有极大的深厚性和坚韧性，并非西方思想的流动所能颠覆。当然，中国在开放格局中实现经济发展和思想流动，对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出现许多新现象、新问题，产生各种矛盾和挑战。所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sup>②</sup>。

可见，与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将经济活动空间想象（假设）为牛顿式“绝对空间”不同，按照域观范式的思维，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一定的局部空间发生的，经济活动空间并非均质性的绝对空无的空间，而是存在制度、文化以及各种思想性域观元素的具有现实境况的域态空间；在不同的域态空间中，原本就有各自的“价值文化”“思想习惯”“行为规则”。因此，各国、各地区当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时，将发生各种域际现象，即不同“域境”或“域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不仅有商品及服务贸易、人员流动，还有思想流动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衔接（或矛盾）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尤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地区，以至全球治理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和全球的治理体系必须向着更加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更适应于现代经济演变的现实状况）的方向进行建设和改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规模也极大增长，所以治理体系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即实现“现代化”。很显然，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向既不可能是全盘西方化，也不是僵化固守，完全排斥西方思想；开放和全球化并不是全世界完全同质化，不

可能有完全“无界无墙”的域际差异的绝对自由；但也更不能自持“优越”而“夜郎自大”，拒不接受思想“流动”，特别是思想性域观元素的跨界跨文明流动。“有秩序的充分流动”“有边界的充分自由”，应是人类寻求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可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方式。

## 五、探索创造可行的域观新常态

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看，“贸易创造世界经济格局”是一个重要规律。其中，贸易密集的地区就会逐步形成具有越来越紧密联系的区域，而区域之间的贸易频繁化，就会使这些区域形成更大的区域。如果区域间的贸易联系跨越国界，就形成各种跨国性的区域。各国往往倾向于在这些区域达成更顺畅的贸易关系，突破国际壁垒，成为国际自由贸易区。当然，更为理想的是使世界各国间都实行自由贸易关系。这就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这一理论逻辑描述的是一个经济理性主导的过程，从经济效率上说，当然是理所当然的经济进步方向。但是，现实是复杂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在《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指出：“人或许是聪明的动物，但几无证据显示人是天生‘经济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性是否真驱使人竭尽所能积累物质以追求个人最大的福祉，几无证据可资证明”<sup>[6]19</sup>。“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sup>[6]14</sup>

经济学家通常将复杂的现实经济尽可能抽象为一个经济理性主导的过程，以求理论分析和推断的逻辑自洽和严密；而真实的现实却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和影响的。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因素和价值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而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并非由人类的单纯理性过程所决定。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似乎可以被理论家推演为一个“标准型式”的动态过程，因而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过程都有某种相似的推进

① 保罗·罗默特别讨论了中国航空因引入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FAA）的航空管理制度，使中国航空事故大幅度减少，中国“现在是航空事故最少的国家之一”。

② 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轨迹。但实际上各国各地区的工业化过程的表现却是各具特点的。所以,经济发展过程总是表现为某种具有“域观”性特征的道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到了工业化之后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千姿百态。也就是说,人类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域观性,尽管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其域观差异性是非常强烈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域观性表现本身就是一个客观规律,只不过是客观规律的呈现绝不是唯一形态和统一方式。

回顾新中国70年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所走过的极具域观特色的发展道路。不同经济(所有制)成分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区,以至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区(一国两制),在中国这个巨大国家的复杂经济空间中,形成了域观结构极为复杂的巨大市场空间。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域观成就和经验,在全世界中是极为壮观的;在人类发展上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非常可贵的。

当前,中国又在进行一个伟大实践,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践,人类发展中的域观现象和域观关系,将在此过程中集中显现,可能发生许多极具戏剧性的“故事”。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三个经济体,虽然位于一个紧密的地理区域,却各具非常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特性。可以说,三个经济体之间的思想性域素差别是非常显著的。所以,由三个经济体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具有显著的“域际”性,这是一个由特质显著不同的“域”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关系复杂地区。在经济学视角中,粤港澳大湾区产生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域观”问题,具有不同特性的三个“域性”经济体,需要整合为一个更紧密联系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时,如何实现域际沟通、协调和交融?

粤、港、澳三个经济体具有不同域性特性的,尽管地理区位紧密相连,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形成相互间文化差异较大,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更具有很大的本质性差别。因而,我国对香港、澳门实行了“一国两制”的治理模式。从经济理性上说,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三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及其他经济及人员交往关系越自由、互联互通越顺畅,就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这三个经济体的“域性”特质的深刻差异,以域观思维的观察,试图完全拆除相互间一切壁垒和管制界限,成为高度同质的统一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又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粤港澳地区即使要达到像欧盟那样水平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实现像欧盟内部那样的高度自由流动的经济关系,包括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也仍然可能面临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当然是“一国两制”这个特殊政治关系。欧盟经济体中的各国虽然本质上是国际经济关系,但可以实现高度一体化,以至几乎可以达到“国内化”的程度。因为重要的是,虽然欧盟各国主体不同,但国体性质是基本相同的,即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粤港澳虽属于同一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国内的不同区域间的关系,并且在许多重要方面和领域,其相互间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表现得更大于欧盟内部各国间的差异。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治理体系不可能模仿世界上哪个其他经济区域来构建,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构建好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创新方向是,如何安排好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受阻的可流动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流动自由化程度。总体来说,商品流动的自由化相对比较容易,这主要涉及关税差别、卫生即质量标准差别、文化产品(例如图书)的道德标准差别、知识产权制度差异等。资金流动的自由化,涉及对于“金融自由化”的理解和处置,面临一些关系金融体制和金融安全方面的敏感问题以及外汇管理制度差别等。特别是数字货币的迅速发展,包括区块链技术导致的对法币体系的冲击,金融当局不得不采取各种管制措施。因此,粤港澳之间的金融制度差别将会成为一个需要协调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人员流动的自由化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体系中比较复杂关系的问题。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内人员流动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人员身份多元化条件下的国家管理问题。也就是说,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如何被赋予不同的自由流动权利,才能适应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要求。尤其是由于国家治理制度和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别,相对于我国港澳地区人口,内地人口在粤港澳大湾区自由流动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至于信息流动自由化问题,则主要是基于粤港澳间的治理体系性质差别的不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差异化管控要求,体现了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政治制度性质。这虽然可能(总是)被国际社会所夸大,实际上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不过,在此方面,互联网的管理和联通规则将可能成为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

在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界限可能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数字货币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时,资金流完全表现为信息流(数字流),这将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自由化形成新的挑战,需要尽快研究。

总之,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调和经济自由化,不仅仅是经济理性问题,而是涉及深刻而广泛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问题。社会科学理论界必须投入更大力量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前沿性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重大现实挑战,要有前瞻性的关注和研究,从而科学地预见粤港澳大湾区的域际演化前景。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域观现象,全方位反映了思想因素和域观元素在相关地区间流动交融,所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以此思维论说,我们深入观察现实世界,则将产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图景。

## 六、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两大域观常态体系的史诗级博弈

目前,人们凡说到重大经济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无不是言必涉中美贸易摩擦。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部思想因素的大规模流入,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因素流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历经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由此,学界对中国未来走势就产生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识。一种意识是,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同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认为只有西方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才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的未来只有唯一的一种“常态”,即微观经济学所设想的(实际上是“假设”的)状态:私有企业是原子般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无障碍无干扰(无补贴、无关税)的匀质空间中自由竞争、自由贸易;除了这样的“常态”之外,其他都是不正常的(因此,有学者断定,经济学范式和体系也只有唯一的“普世”图景)。另一种意识则是,中国经济无论如何发展和现代化,也不会同质于西方世界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另一种“常态”。也就是说,人类在发展的世界中,不是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的经济“常态”,而是可能有多种可以有效运行的经济“常态”。各种经济“常态”体系的共性是“市场经济”,而其特性则由不同的域观因素所决定。总之,现实的世界经济不是“微观”特征主导的,而是“域观”特征主导的。

当前和未来长期将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领域的摩擦,反映了两大域观常态体系的史诗级博弈。这种博弈不是谁“吃掉”谁或“消灭”谁,也不是谁同化谁,甚至不是谁战胜谁;因为谁也消灭不了对方,也同化不了对方。所以,即使是有某一方在某一时期的胜负输赢,那也是相对的。在中美关系中,不仅仅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相互间交易、融合,更重要的是,思想因素的流动也将越来越具有双向性。即不只是西方思想流入中国,影响中国;而且中国思想因素也会流向西方,影响西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中国思想因素”不只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指在当代以及未来的中国所产生的助推经济活动的思想因素。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思想因素也会流向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最近,一部美国电影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引起广泛关注。这部纪录片较客观地反映和预示了一个世纪大趋势:中国单方面引入西方思想因素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在经济活动中,由西方向中国单向思想流动的态势将转变为东西方思想的双向流动态势。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地崛起,并且成为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力量,由此,世界经济的域观格局会极大改变,从而使得美国经济也需要吸收中国经济的思想因素,才能适应这个巨变的时代。影片所纪录的中国福耀玻璃制造公司在美国投资设厂的经历表明: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思想因素(中国企业的“想法—做法”域观元素)向美国流动,可以改变美国制造业“锈带”的命运,使美国制造业的老迈企业再获新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经济的域观状态。例如,关于企业生产组织的方式和工会地位的安排等,被注入了中国经济的“想法—做法”元素。这是反映世界产业发展中,思想流动态势变化的一滴可以透视太阳的水珠。可以说,这部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创立的电影公司所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深刻揭示出:如果当代中美两大各具域观常态的经济体系相互开放将产生怎样的博弈关系。其新颖寓意是:中美经济博弈的主题并非谁胜谁负,更不是幻想谁吃掉谁,或谁同化谁,甚至不是简单地争个谁“老大”谁“老二”;而是两国都要借助思想流动的助推,迎接全球经济适者生存关系的重置过程,以应对追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都必须改变以往的“活法”和“治法”,注入新思想的活水,形成各自的“新常态”和现代治理体

系,实现“长治久安”的梦想。

## 七、结语

本文致力于讨论一个问题:人类世界的经济体系,并非传统主流经济学所想象(假定)的抽象微观经济世界,而是呈现为域观结构的非同质多元化主体共存的经济世界。后者受到各种思想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而前者却完全无视思想因素的存在。只要承认经济体系的域观性,就会承认思想因素及其在不同域观世界中流动的重要意义。所以,所谓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并非仅仅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或配置)表现,而且是受到思想因素及其流动的强烈作用和影响的历史过程。思想

因素是不同经济常态体系中的“域观元素”。

既然拥有不同域观元素的各种域观经济的“常态”系统是共存和交互作用的,那么各种经济常态系统的治理体系,以及各经济常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治理方式,就成为人类发展中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之所以说需要“不断解决”,是因为人类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常态”以及各“常态”间的关系,是高度动态的、进化的。由于常态体系及常态体系间关系总是变化着的,所以人类的思想必须与时俱进,既创造常态体系,又不断应对常态体系变化的挑战;同时,要保持“生活之树常青”,思想之源常新;只有解放思想,欢迎思想流动,才能繁荣经济,丰富世界。

### 参考文献:

- [1] 金碚. 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2): 7-23.
- [2] 金碚. 论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识别发现逻辑[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7): 5-23.
- [3] 保罗·罗默. 全球化与追赶型经济增长[J]. 中国经济报告, 2019(3): 115-120.
- [4] 罗伯特·H·弗兰克. 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M]. 谢朝斌, 刘寅龙, 译.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57.
- [5] 托尔斯坦·凡勃伦. 边际效用理论的局限[M]//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张林, 张天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6] 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M]. 黄中宪, 吴莉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Ideological Flow , Regional Normalcy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JIN Bei<sup>1 2</sup>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Beijing 100836 ,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450001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such a phenomenon called “regional normalcy”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economic elements but also human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a certain region. Besides the trade activiti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countries , human ideological flows move along with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multi-element regional normalcy. Though the phenomena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how some common features in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real develop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countrie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 or in terms of regional normalcy. The economic growth or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like land and capital ,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deological flow and its effects. In conclusion ,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ue to their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 the governance system concerning different economic normalcies and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should be one top issue in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flow; regional normalc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冯 蓉)